

1806

株洲名人系列史料



东1591

王克生
興國際問題研究所
李群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株洲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主 编 罗章生
责任编辑 罗章生 周邦发
罗传卫
责任校对 罗传卫

王克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

《株洲文史》
第 15 编

编辑出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株洲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313 字数：30万
版 次：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插页：10
印 刷：株洲市煤田印刷厂 工本费：4.50元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 湘株文登08号



王允生遺像



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芃生受命为交通部次长，赴越、缅、印洽商修建滇缅公路和雷多公路，以打破日军封锁。图为王芃生在云南与土司合影。



王允生墓

王允生逝世后葬南京麒麟
门外小白龙山。

王允生座右铭墨迹

存心為人則無往不利隨緣自得
遇事認真則終身不敗
和而不同則不失所守犯而不校
則不失所親博而能約則常得其精
信而不迷則常得其真

王允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派出代表团赴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特别大会，王芃生为代表团顾问。此照片摄于1932年，后排右一为王芃生，中排左一为顾维钧，前排左一为钟贤英女士。

编者的话

王芃生，湖南醴陵（现属株洲市）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将主任。在抗战期间的陪都重庆，人们往往把他与“日本问题权威”联系在一起。王芃生曾五次东渡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早在求学期间，就对日本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他不仅了解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而且了解日本的人文历史，不仅了解日本的风土民情，而且了解日本的黑社会组织。因此有人说他是“日本通”，也有人说他是情报界的“神秘人物”。

王芃生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尽管当时与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统、中统齐名，但与军统、中统却大不一样。它成立于国难当头的抗战初期，创业颇为艰难；它的组成人员，绝大多数为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它所从事的情报研究工作，主要是针对日本及其敌伪组织；它的工作方法，虽然重视对外勤人员直接攫取情报的成果，但更重视对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综合比较分析。因而它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偷袭珍珠港、德苏战争的爆发、日本的投降等等，都能在事前作出准确的判断，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都是军统、中统及其他一些军事情报机关所望尘莫及的。

王芃生出身贫寒，一生忧患，满腹经纶，志尚高远。但由于受其依赖的政治集团的制肘和他个人政治思想的局限，本想竭尽全力报效祖国，却落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七七事变”之前，王芃生曾多次向蒋介石集团输诚，提供

情报，但均未得到蒋的重用。抗战爆发后，蒋之所以任用他，也只看中了他在对日情报方面的特殊才干。然而由于他主张坚决抗战到底，有悖于蒋的对日妥协和坚决反共的政策，因而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王芃生和他所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不仅遭到军统、中统的挟制，而且蒋介石的态度也是既信用，又不信用。所以日本投降以后，王芃生就受到了冷落，以致忧愤去世，国际问题研究所也被迫解散。

《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回忆录。汇集了海内外原国际问题研究所成员、王芃生的部属、亲友等共25篇文章，均为“三亲”史料。它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了王芃生的一生及其进行情报研究工作的成就。同时也反映了国际问题研究所从成立到解散的曲折过程。由于作者各自的经历和社会环境不一样，因而对某些史实各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对一些回忆互相有出入的历史事实，凡我们能够查证核实的，都作了核实。一时无法核实的，我们秉着求同存异的原则，采取了多说并存的做法。

第二部分为王芃生遗著。辑录了王芃生生前的《回忆与检讨》（自述）、《时局论丛》（选载）、《莫哀歌草》（选载）和《胶澳接收纪念碑铭》等。所选文章均按原文排版，不作删节，以便保留历史原貌，也更便于我们研究王芃生的抗战思想。

第三部分为文献资料。需要说明的是，王芃生及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文献资料很多，但在王芃生逝世和国际问题研究所解散以后，绝大多数资料已经移交。王芃生私人保留的一些资料，原来一直由钟贤淑女士保管，大陆解放后，也绝大部分上交政府有关部门，少数私人信件、笔记、手稿等已在“文革”中散失。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次刊出的这些文献资料，大都是从过去的报刊上摘抄下来的，并不包括档案资料。

第四部分为王芃生大事记。

第五部分为国内报刊有关文章、著作篇名索引，可供研究者检索。

我们编辑《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目的，主要是汇集王芃生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有关史料，为史学界研究国民党的历史，研究王芃生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提供一份较为翔实的资料。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敬希海内外知情人士和史学界专家、学者给予指正。同时，希望知情人士继续给我们提供史料，以便再版时修正补充。这本史料专辑的征集、编辑工作，历时将近三年。在这期间，我们得到了王芃生的亲友、部属的大力协助和支持，特别是王芃生的夫人钟贤英女士（现居美国）和上海图书馆的陈石铭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史料、资料、照片。对此，我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1990年8月30日

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

目 录

第一部分 回 忆 录

回忆王芃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王亚文	(1)
缅怀爱国主义战士日本问题权威王芃生和 国际问题研究所	袁孟超	(15)
回忆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	潘世宪	(35)
我所知道的王芃生及国际问题研究所	郭福生	(68)
王芃生及其国际情报工作的回忆	辛先惠	(82)
王芃生开展对日情报工作之实绩	张令澳	(94)
追念一个大不平凡的国民党员	邵毓麟	(107)
怀念好友王芃生先生	何凤山	(118)
怀念王芃生及国际问题研究所	简伯鄣	(129)
我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工作经历	胡又深	(136)
我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回忆	曾秉璋	(145)
我与王芃生先生的交往	邓文仪	(153)
我对王芃生先生的追思	刘沫尧	(157)
王芃生先生二三事	陈敦正	(163)
缅怀抗战时期的王芃生	陆久之	(166)
我所知道的王芃生先生	游弥坚	(168)

王芃生先生的生平及其著述	陈固亭	(171)
我与王芃生先生	马静远	(177)
追念王芃生先生在土耳其的成就	马明道	(179)
追念芃生先生	高一萍	(182)
怀念先夫王芃生	王钟贤英	(186)
深切怀念我的伯伯——王芃生	王尔焰	(190)
回忆伯父王芃生	王尔彥	(194)
怀念芃生伯伯	王尔寿	(199)
悼念芃生表叔	陈尔靖	(202)

第二部分 遗 著

一个平凡党员的回忆与自我检讨	王芃生	(205)
附：关于王芃生《一个平凡党员的回忆与自我检讨》的补正	潘世宪	(244)
《时局论丛》【选载】		
附：评王芃生先生的《时局论丛》	陈石铭	(247)
《时局论丛》原编选者言	卢广声	(250)
《时局论丛》原序	赵乐平	(252)
《时局论丛》原目次		(255)
抗战过程应有的基本认识		(257)
不降必胜的道理		(265)
中国抗战对世界大战的贡献		(273)
敬告罗斯福总统		(276)
邱吉尔广播的重大性		(283)
欢迎第一任土耳其公使		(289)
看清日本的真相		(291)

日本的复杂怪奇和其他	(295)
万木无声的日本政局	(302)
近卫的书翰值什么东西	(309)
来栖赴美与敌临时议会	(314)
如此天皇	(319)
拿倭寇的“最后诊断书”当拜年片	(325)
胶澳接收纪念碑铭	王芃生 (333)
《莫哀歌草》【选载】	
《莫哀歌草》词三十四首	(335)

第三部分 文献资料

国民政府褒扬令	(350)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祭文	(351)
王芃生先生碑铭	(352)
报 摘	(354)
王芃生传(载《醴陵县志》)	刘鹏年 (356)
悼芃生兄(载上海《大公报》)	王芸生 (360)

第四部分 大事记

王芃生大事年表	本会编 (363)
---------	-----------

第五部分 有关文章著作索引

有关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文章著作篇名索引	(385)
------------------------	-------

回忆王芃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王亚文

初识其人 深感不凡

我与王芃生同宗同族，他名王大桢，我名王大安，排行兄弟辈。因我比他小十余岁，我参加大革命时，他已在外交界崭露头角，从小仅闻名而已，并不相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奉中共党组织之命南归，先到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待命，准备回湖南开展地下革命斗争。是时，王芃生正在武汉筹组国际问题研究所，多方网罗人才，从事对日情报研究，在国民党内有“日本问题专家”之美誉。我去见他时，他一面和我谈话，一面似有所思，问道：你是不是族间某人的儿子？你们那里大革命时期，有一个被通缉的共产党人，走出外面多年，还活着吗？我说，那个参加共产党的族间兄弟，人家传说老早死了。他说：“现在不又是国共合作吗？如果没有死，可以找回来……”这次我和他见面时，在座的还有一位随他到过日本的同胞弟弟王峨生和一位年龄与我不相上下、之江大学毕业的同族兄弟王大彤。我想他们可能猜测到，当年被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员，不是别人就是我。我素知王芃生亦穷孩子出身，刻苦

王亚文：湖南醴陵人，1924年入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已离休。

好学，志尚高远。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积极参加策动湖南新军起义。在南京复成桥陆军军需学校（后迁北京）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由该校校长张叙忠（孝仲）保送留学日本，先就读于日本陆军经理学校高等科，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帝大求学时，开始搜集材料，研究国际时事和日本侵华政策。也曾喜读《资本论》，对社会进化的规律和人类社会一定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有一定的认识。他曾语人曰：“社会主义思想的流行必将普及全世界，这是一种事实；社会主义运动是急做慢成功之事，也不可否定。问题在于我国经济繁荣与生产力发展，还不到一定程度。民有、民治、民享不是林肯提倡，孙总理所赞成的吗？中国如能实现，就算够好的了……。”尽管他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各有所属，各有所从，但我肯定他不会损人，不会加害我这样一个同宗同族的小兄弟。于是，我将随身携带的“太平洋学会”出版的一份杂志，其中有我从英文翻译出来的一篇关于《日本必败》的军事论文，交给他看。他叫我放下，过三、五天再去见他。几天后，我去见他，他问我是否愿意到菲律宾去，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设法在那儿开个铺子，做对日情报工作。

这次谈话后，我即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叶参谋长剑英，恰好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也在座。我汇报了有关情况以后，他们说，王芃生和刘斐都是你们醴陵人，这两个人是国民党里的两个人才，对抗战必胜都是有坚定信心的。王芃生发表有关方面的文章很多，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以及各阶层那些抗战信心不足的人很有影响，有振奋启聩的作用。他叫你去菲律宾，可能性不大，因为王芃生为人很仔细，很谨慎。你虽然没有直接承认是共产党员，但他还是会有想法的。他不反对共产党，但也不会马上让你去菲律宾。又说，此人很爱才，不一定会放弃你，可以听听他以后怎么说。你要积极做好他的工作，使他能很好地靠近我

们的党。目前是抗战初期，我们党中央对国民党的高层人士，只要他们主张抗战，起到坚持抗战的作用，都可进行一般社交联系，广交朋友，相机开展工作。国际问题研究所机构庞大，几乎所有沦陷区域，如上海、南京、北平、港澳等地，都有他们的工作点站，需人做事。叶、周、董等领导同志的一席话，给我很大启发。后来我再去看王芃生时，果然去菲律宾之事，缄口未提，只说：“我这里要译的英文文章很多，亟需请人翻译，我将不时送些给你，你译好后，我再不时派人来取，报酬从优。”我表示同意。从此，我们两人心照不宣，我奉中共党组织之命，经常与王芃生接触，逐渐成为我党对他半公开的联系人。

心怀坦荡 抗战第一

王芃生就任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后，一面从事对日情报的研究，一面强烈呼吁：“抗战必胜”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他的理论是：“抗战即革命”，“抗战是国民革命的重要阶段，先有民族独立，才能建设一个繁荣昌盛、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在用人措施上，他提倡“第一是人才，第二是人才，第三还是人才”的观点，崇尚先贤蔡元培的高尚风范，主张兼容并包，不拘一格，用其所长。汇合“孔子仁义”、“我佛慈悲”、“基督博爱”、“可兰救世”，只要有益于抗战大业，有益于国，有益于民，都可冶合一炉，共同抗日。

王芃生的抗日观点和主张，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应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在国民党内要付诸实施，却不无困难。对此王芃生早有预见。他不仅敢于负责，而且对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和困难，洞烛机先，予为之谋。如人才使用问题，国研所成立之初，王芃生为广泛网罗抗战人才，曾向蒋介石奏议并获批准，制定了一种“工作派遣证”，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可使用，以出

入广大沦陷区域和敌伪之间。这种“工作派遣证”，为国研所接纳进步人士和加强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打开了通路。

不久前，我看望一位已八十有三高龄、今犹健在的女同志，她对我说了这样一件事：

“七·七”事变爆发后，举国同仇，奋勇抗击日本军侵略，国民党中央派胡适、张静江往欧美，争取英美支援，派蒋百里偕史丹法尼（意大利罗马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曾任墨索里尼第一任财相，同情中国抗战，为墨索里尼囚禁，战后获释）顾问往德意，分化德日、意日。出国前夕，我们有位姓徐的同志经王仁林教授介绍，跟随蒋百里一道出国。无如偕同蒋百里出国的人，先有人在，途经香港时，恰逢王芃生在港布置情报工作，蒋遂将徐介绍给王芃生。王芃生和蒋百里同为当时主张抗战到底的知名人士，又同为历史悠久、闻名中外的《大公报》“星期论文”专栏的特聘专家。两人友情甚笃，过从甚密，且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建立，又系蒋百里所建议。王芃生此时建所伊始，正需要人，于是立即同意徐同志入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用我们这位八三高龄的老同志的话说，这是在香港国共双方领导点头的，当然也会汇报给蒋介石知道。因此，徐同志自香港回来后，即往重庆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尔后徐被派往浙江淳安创设外勤办事处，亲主其事，并迅速建立电台；由我们一位技艺特高的长征干部李静安同志任电台台长。不久，办事处移至江西铅山，继续开展对敌情报工作，为抗日作出了很大贡献，国共双方都很满意。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不以国际问题研究所对敌工作做得好为然，相反对王芃生用人多有责难，暗地里施加压力。王芃生苦苦顶着，并向我们的同志打招呼：“眼见逆流，不可锋芒太露，尽量含蓄一点，小不忍则乱大谋……”表现了临危不惧，以抗日为重的坦荡心怀！

抗日战争结束，徐主持的办事处迁往上海，设立于陕西南

路，李静安亦由铅山来上海工作，改名李白。时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秘密电台，命李白为台长，带职在国际问题研究所驻上海办事处工作，直接与延安联络，提供情报。1946年10月，国际问题研究所被迫解散，国共两党和谈破裂，电台工作发生困难。1948年冬末，电台为国民党破获，李白被捕，壮烈牺牲。李白烈士的夫人裘慧英同志，现仍健在，回首当年王芃生对我们工作的扶持帮助，至今仍感佩不已。

这位八三高龄的女同志还说，当日他们在香港接受党的任务后，在王芃生的指导帮助下，工作极为顺利，相互间坦诚相见，真是国共合作的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王芃生曾对我们的一位同志说：“今天我们在一起合作共事，将来胜利了，我们还可以住在一块，两起房子，两起门，两个大门都关上，各以著书为乐，两个凉台，设一通道，不时可以上凉台，尽兴畅谈。”由于王芃生早逝，这一天终久未能实现，但不难看出，王芃生对我们的同志，对我们的党，确实是有感情的。

王芃生为了坚持抗战，不怕政治压力，不怕责难非议，凡是与他共过事的人，都有切身体验。当年王芃生有个侄子王尔宣，年龄二十有三，在安徽工作。1939年8月我新四军苏豫边区总队驻皖办事处进驻泗县后，恰王尔宣被安徽省政府派为灵璧县长。军统戴笠疑其为共产党人，遂向蒋介石告密。蒋不察实情，即调王尔宣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反复盘查，迫其离皖，实际亦是对王芃生施加政治压力。戴笠的这一套，王芃生早已看穿，淡然置之，全副精力放在对日情报工作上。这下戴笠束手无策，蒋介石也徒增烦恼，只好不了了之。

力反妥协投降 坚持抗战到底

“八·一三”事变之后，京沪失陷，接着冀、鲁、察、绥、